

《淮南子》在哲学上，对生命赖以存在流变的自然之“气”极为重视。“气”作为一种生命要素，从老庄以来就得到不同程度的阐释，形成具有鲜明道家特色的“养气”思想。老子虽对“养气”谈论较少，但已从宇宙生成与养生技术的角度，对“气”有所论述。庄子更是着眼于主体精神的自由状态，阐言养“气”以得道的生命哲学及境界。《淮南子》对“气”的认识，主要渊源于老庄，同时也受到先秦阴阳家、儒家“气”论思想的影响。

“养气”与个人生命的生发

在中国思想史上，《淮南子》是较早明确提出“气”化论宇宙观的著作。《淮南子》“气有涯垠，清阳者薄靡而为天，重浊者凝滞而为地”的“宇宙生气”思想，为生命创设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生存图景，使人类作为主体化的生命存在得以与“气”的宇宙构成要素建立起内在沟通关系。

《淮南子》认为，“气”的产生与作用促使世界从“虚无寂寞”的原初状态，逐渐演进到“阴阳错合”的和谐状态，并在此过程中化形而成自然事物。基于这种“气”化论的世界演生理念，《淮南子》推阐老子“万物负阴以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的思想，不仅将形上之“道”落实于形下之“气”的具体承载，更是将“道”在运动中所具有的生化万物的动力机制和生成态势开显出来，使宇宙创生有了逻辑展开的可能，进而认为世界万物都是阴阳之“气”相互冲和后的自然产物。

《淮南子》对“精气”说的发展，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政治方面。它将“精气”说与儒家思孟学派的“诚心”思想结合起来，进而推阐自身的治国理念。《淮南子》用“精气”说对“诚心”进行新的阐释，强化后者的思想

北宋宰相李沆的为官操守

□晏建怀

做官就是做人，其操守如何，决定了做官的好坏，尤其是宰相这种主持朝政、协调上下、以落实国家大政方针为己任的朝廷重臣。态度过于暧昧，难免为君子所诟病。言行有失检点，恐怕为小人所利用。不但要善于律己，而且要懂得律人，既要管好自己，更要管好部下，才能在朝廷各色人等间昂起头、挺直腰。

李沆是北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任命的宰相，他手握重柄，却平和而又知足。别人当宰相，住的是豪华别墅，他当宰相，府第狭小，空间逼仄，议事厅门外仅容一匹马调头。有人劝他建座大宅子，他说：“国家的俸禄和皇上的赏赐都十分丰厚，按说建座宽敞的宅子是不没什么大问题。不过，正如佛典所言，世界是有缺陷的，怎能事事圆满、件件称心呢？建豪宅，少说也要一二年，人生朝不保夕，乌把巢安置在一根小枝上就已经非常满足了，我又何必劳神费力去追求住宅的宽敞呢？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国家大事上。”一个天天在名

《淮南子》气论及其黄老治国义蕴

□高旭

《淮南子》将“精气”说与儒家思孟学派的“诚心”思想结合起来，进而推阐自身的治国理念。这种贯通融合“精气”“诚心”的思路，彰显出《淮南子》会通道儒、以儒补道的汉代黄老特色，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极为强烈的经世治国的时代精神。



“养气”与治国

由于在思想上既试图为西汉统治者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，也力求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，提供一种较为完备的理论学说，《淮南子》对“气”的存养问题，不仅从一般化的生命个体着眼，更是从政治化的生命个体出发来着重探讨，追求实现一种具有黄老治国义蕴的理想“养气”状态。

在道家思想史上，《淮南子》是将“养气”与“为君之道”关联最为紧密者。在它看来，为君者在修养上要慎守“三关”，而这种对目、耳、口

而不定，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；血气滔荡而不休，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。”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，易于因外在的物质欲望，引发自身“血气”的“感动”不安，而“血气”之动又能引发人们谬误的现实行为。对此，《淮南子》指明解决之法，主张人们对“血气”采取主动的调控措施，使其与“五藏”“胸腹”保持协调，做到“气”“形”相宜。

在《淮南子》看来，“志气”和“血气”虽然都是“气”的具体表现，但并不能等同，因为“血气”侧重于生命的生理方面，而“志气”则是指主体精神上特殊的情感、意志、意识

等心理反应。如果说前者通过人体的“四支”“五藏”发生运动，那么后者尽管与“五藏”也有一定关联，“气志者，五藏之使候也”，可实际作用却是经由主体心理活动来实现的。

因此，《淮南子》秉持老子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的养生理念，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力求避免“躁而日耗者以老”的弊端，做到“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”，达到“静而日充者以壮”的良好状态。《淮南子》对“志气”之“充”“耗”的辩证反思，赋予道家生命哲学更为丰富的心理学内涵，显示出汉代道家对生命主体意识变化的极为深细的观察与思考。

元代倒换“昏钞”的做法

□方宝璋

纸钞在流通过程中难免会损坏破烂，这样的纸钞，就称作“昏钞”。昏钞会影响正常的纸币流通，导致百姓手中的纸币贬值。因此，政府倒换昏钞，是树立纸币信用、维护金融秩序的良好措施。一直以昏暴统治著称的元代，在这方面倒是做得不错，制定了一系列倒换的措施。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年）三月，《至元宝钞通行条例》就规定：“民间将昏钞赴平准库倒换至元宝钞者，以一折五，其工墨依旧例每贯三分。”就是说元代昏钞倒换新钞，按5:1的比例兑换，另加工墨钱3分。

元政府为了简化倒换昏钞手续，便于民众倒换，并节省管理成本，对倒换昏钞机构进行精简，罢废州郡钞库43处及多余官典，将倒换昏钞事务归各处掌管课程的茶盐运司官、路府州县提点官兼职负责。

元政府对倒换的昏钞，要统一集

中烧毁。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年），元政府规定：“所倒之钞，每季各路就令纳课正官，解赴省部焚毁，隶行省者就焚之。”为了防止昏钞在烧毁前被人偷盗重新使用，或挖去其中的面额数字接补于其他纸钞上，大德五年（1301年）四月，元政府规定：对倒换到官的昏钞，行用库首先要立即加盖退印注销，库官清点数目，并检查昏钞上是否有挑剔、接补、诈伪、短少等不法行为，然后提调正官将昏钞封存标上印记，每季于次季第一月十五日之前，起纳课程官会同行用库官吏一同押运省部烧毁。

为了禁止不法官吏在倒换昏钞中多收工墨钱，或有侵盗昏钞、接补等犯罪行为，元政府制定了有关法律条文，对此进行惩罚。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十月，整治钞法条画规定：“收倒钞，当面于昏钞上就使斲毁印，封记，将昏钞每季解纳。如不使毁印者，决杖五十七下，罢职。”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，御史台针

对当时发生的将倒下昏钞不使退印、同谋分使等多起案件，重新强调对倒换昏钞、烧毁昏钞中不法行为的防范与惩罚，重申了朝廷在倒换昏钞中的4项禁令。

一是对倒换到官府 的昏钞，必须随即加盖用讫退印注销，否则，提调官、库官、库子等有关官吏必须受到惩罚。二是对于押运省部等地烧毁的昏钞，提点官必须认真清点，监视装运，直到烧毁地点。如提点官不认真负责，发生盗窃昏钞等事情，必须受到惩罚。三是倒换昏钞时，官吏不得刁难勒索，多收工墨钱，否则，违犯官吏则要受到惩罚。四是平准钞库的金银、宝钞等，各路总管和管民长官必须每半个月核点一次，禁止挪用借贷，否则，也必须受到惩罚。

元人郑介夫在倒换昏钞的做法上，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，认为纸钞在使用流通中破损昏烂是正常的，不必予以倒换。倒换昏钞只是使城市中一小部分人能够倒换，而对于大多

数偏远地方的百姓来说，根本无法实现。倒换的昏钞被烧毁，其中也烧掉了一些还可使用的昏钞，这是一种浪费，并使民间纸钞日益减少。因此，倒换昏钞于国于民都不利。他说：“每岁发出钞本，倒换昏钞，止收三分工墨，可谓巧于利国，廉于取民矣。殊不知一贯出，一贯入，钞行民间，仅有三分，而民间之钞反损三分也。”有鉴于此，郑介夫主张：“每岁发出各省，勿令倒换，就支作官吏俸钱、和买丝料等用，却以民间所出夏税折粮、课程、赋罚诸名项钱，起解大都，以供支持赏赐及随朝俸给，庶国家钞本俱为实用，而钞散天下，民亦无损，行之数年，民间之钞不可胜用矣。”这个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现实的，也得到了应用。



挥手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一切都好，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，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，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，坚决粉碎敌人的‘围剿’，用战斗的胜利来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！我们内部的事情，不要着急，中央来了就会得到解决的。”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刘志丹在“肃反”关押中被党中央营救获释后，从面对不公平的待遇，并告诫那些蒙受冤屈的同志说：“中央来了，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”，劝大家把过去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，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解决好的。正是靠着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，南梁革命根据地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，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，这也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巨大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和战斗力的核心所在。

群众领袖是“求实开拓”的杰出代表

求实开拓是南梁精神的精髓，是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为代表的群众领袖，带领人民群众创建和发展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根本保证。他们始终坚持真理，勇于担当，不断创新，坚持把党的革命理论同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，按照客观条件决定政策，独立处理重大革命问题，对建立革命武装、创建

（上接1版）朱德满怀深情地评价：“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，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，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，虽屡经失败，但他百折不回，至死不变，垮了再来，再垮再来，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。”这是对陕甘边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。

群众领袖是“顾全大局”的典范

顾全大局是南梁精神的特质，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是南梁精神中顾全大局的典范。在革命斗争中，他们不仅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，而且具有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，不为一己之私而牺牲革命利益。虽然他们在错误“肃反”中一度遭受冤屈，但是他们忍辱负重，严于律己，襟怀坦荡，能够从党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，妥善处理党内存在的一些分歧，尽一切努力维护党的团结，维护红军部队的团结，真正做到了“相忍为党”。

1932年2月，由于西北反帝同盟军主要领导人在部队整顿问题上意见分歧，发生了第1支队缴第2支队枪的“左”的错误，在危险时刻，刘志丹说：“2支队的把枪交给1支队，不要反抗！”他的冷静处理使事态未恶化，保存了革命力量。1935年2月，

陕甘边区根据地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取得胜利后，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却无端指责南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犯有“右倾机会主义”“逃跑主义”“梢山主义”“浓厚的土匪主义”等错误。面对一大堆批评指责，为不影响团结、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，刘志丹、习仲勋等领导人没有展开任何讨论和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，而是以革命利益为重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。同时，为支援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开展反“围剿”斗争，南梁根据地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抽调部分武器、经费，并派出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，支援陕北开展反“围剿”斗争。1935年9月，“肃反”开始时，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，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予以逮捕。习仲勋对此也进行了抵制，并不顾自己可能随时遭到逮捕的危险，坚守岗位。当时有同志提醒他暂时离开去躲一躲，习仲勋坚定地说：“不能走。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，把我杀了，我也不能走，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，我怎么能走呢？”刘志丹在“肃反”中被关押，由于刘志丹在根据地红军和干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，根据地300多名红军和群众聚集到瓦窑堡，要求见一见自己的“老刘”。迫于民意，那些“左”倾错误的执行者不得不把关押中的刘志丹放出来，跟大家见个面。刘志丹向关心自己的干部群众挥

根据地、开展游击战争、实行统一战线、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贡献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。

南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创建和发展的，这需要高超的智慧。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在建立革命武装上，针对陕甘边地区国民党军阀武装、地方民团武装、土匪绿林武装等较多的实际，创造性地实施了“三色”建军策略，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武装。刘志丹说：“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，要经常调个窝，调换着住，这样才能存在”。习仲勋说：“‘梢林主义’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。我们把苏区叫做‘梢林’，这是从三原、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。……‘梢林’，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，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，有利于革命力量生长和存在，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。”为此，他们确立了“狡兔三窟”的发展战略，成功地探索出了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“陕甘模式”。

敢于担当，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，是南梁精神中求实开拓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也彰显出作为群众领袖的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敢于坚持真理、敢于修正错误的政治勇气。在革命斗争中，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，使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。